



長壽縣文史資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長壽縣
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第六稿



YT176/16

长寿县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长寿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前　　言

长寿县政协主席　冉启纯

政协长寿县第九届委员会于1990年初换届以来，在中共长寿县委的领导下，继续遵循周恩来同志的倡导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之精神，坚持“求实、存真”的原则，经过各届人士的大力支持，《长寿文史资料》第六辑问世了。于作者又是一次“集体无意识”的张扬，于编者确是再一次有意识的鞭策。

当今中国正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扇动着改革的巨翅飞腾。“春来无处不飞花”，文史工作理应为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服务，文史资料从内容到形式都要锐新改革，开拓前进，努力适应时代精神之所需，同时要加强与县内外横向联系，扩大交流，相互帮助，相互促进。

文史工作要继续贯彻“求实、存真”的原则，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不溢美，不贬损，力求翔实内容，努力反映我县历史上曾有过影响的人和事，启迪来者，传之后世，同时也要贯彻大团结方针，把文史资料工作作为一项社会事业来办，多侧面地组稿、撰稿，使之日臻丰富与完善。

《长寿文史资料》第六辑能够应我县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召开，与读者见面，由衷地感谢各届人士，感谢作者！如果说这是各届人士和广大作者的支持，勿宁说是他们对《长寿文史资料》的痴情。愿广大政协委员、各届人士及海外朋友

大力襄助，并共举文史之责，手执朱毫，浓墨酣书，使文史工作继往开来，不仅影响今天，而且影响未来，不仅影响国内，而且影响国外，为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服务！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长寿县文史资料》第六辑目录

前　　言	冉启纯	
民国时期		
长寿创办几家工厂始末	李鑑全	(1)
抗战时期		
国立十二中暨热力同学会	汤维耕	(8)
从长寿县清理财粮两政工作看后期的		
国民政府	陈奉权 胡洁	(14)
长寿大桥简介	车家志	(17)
葛兰场的龙灯会	傅道全	(19)
民国时期		
长寿县的苛捐杂税	陈奉权	(22)
民国时期		
长寿县桥夫抬轿情状	汤维耕	(27)
长寿县保险公司概况	陈得瑰	(30)
解放前夕葛兰的商业概况	丁燕平	(33)
长寿傅和 — 竹席之乡	文平林	(37)
长寿县第一位女校长		
——周文郁	余书瑞 整理	(41)
“大名士” — 殷钟道先生	王延庆	(48)
黄佛公其人	何超全	(55)
张蜀骏其事	廖文化	(59)
王爷庙	傅季清	(63)
唐知县二三事	戴师表	(65)

- 范绍增在长寿期间轶事 戴师表 (68)
汪翰林写匾 王维浩 (70)

民国时期 长寿创办几家工厂始末

李鑑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加紧经济侵略，妄图吮尽我国人民的膏血，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诸多工厂倒闭，工业生产萧条，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沿海地区工厂纷沓内迁西南，于时，长寿县也迁入和创办了几家工厂，兹将其简况分述如下：

(一) 秦安纱厂

上海裕泰公司创办纱厂，从英国购进了成套设备。由于抗日战争烽火燃烧甚烈，海运受阻，货至香港由滇缅路陆运西南。然而日寇步步逼近，挥戈滇缅，抢运莫及，沿途遗失清棉机、梳棉机及粗、细纱机的部分零件，历时三、四年，日晒雨淋，锈蚀不堪。湖北省民生纱厂副经理鲁寿安出资4,000万元，廉价买下这套机器，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五月运抵长寿，六月创办秦安纺织有限公司，并设办事处重庆陕西街209号办公。鲁寿安邀集好友吴觉生、吴云峰、柴续旗等(均系湖北人)负责修理残缺的机器。该公司推选鲁寿安任总经理，旋即任命吴觉生任经理，吴云峰任厂长，周文培任协理。

为了使秦安纺织公司能在长寿立稳脚跟，鲁寿安一方面贿赂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何雪竹出任董事长，另一方面拉拢重庆市财政局长沈质清、市政府秘书长沈昌平以及长寿地方势力头目入股，恃其权力占领长寿这块地盘，爰租用河街镇东街王爷庙公房作厂址。斯年八月，除组装梳棉机、粗纱机各1台外，还添购并条机1台。开机400枚纱锭，生产“红寿桃”20支棉纱，“蓝寿桃”16支棉纱。本年用陕棉171市担，折法币401.4万元；郑棉349市担，折法币6282万元，因组装、修理机器浩繁，生产工期短，产量不巨，赢利颇微。翌年，改进技术，利用木制龙筋车面，增开至八百纱锭。总经理鲁寿安视法币贬值，物价陡涨之状，采取吸收大量存款，现金出售棉纱，赊帐收购棉花等措施，筹集资金，陆续修配二千八百枚纱锭，同时向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订购五台细纱机。鲁寿安鉴于国穷民贫之现状，尚立“扫掉穷气”之志，往返于汉口、上海等地，为完善厂的设备，打开棉纱的销路而四处奔波。他外出期间，委任吴觉生、吴云峰管理行政事务，钱箴言管理生产和经济业务，每月凭其邮电报表，于时产量日趋上升，规模日渐庞大。民国三十八年（1949），已有清棉机1台，梳棉机15台，并条机5台，粗纱机5台，400枚细纱机12台，112枚细纱机1台，工作母机4台，摇纱机23台，小包机2台，中包机1台，变压器4具，马达34具……，四年已配足四千九百一十二枚纱锭，全年生产20支棉纱2191.75件，16支棉纱62.88件。管理人员由上年24人（包括技工）增加到40人，技工45人，童工66人，学工18人，杂工58人，护厂的军警6人，粗细纱工人287人。

由于当年产量高，物价猛涨，盈利数额巨增，秦安纺织有限公司于一九五〇年在龙溪河口开工新建厂房（现重棉七厂）。同年七月初，新建铁柱石墙车间230平方丈，饭堂、宿舍、材料仓库200平方丈，七月底由东街迁至新厂复工。该厂股东计150股，入股的有鲁寿安、何雪竹、鲁寿商、鲁相予、鲁云沪、翁显涣、翁显樵、周文培、张新民、张新纪、钱保焦、赵典之、江汉罗、黄日新、熊子民、姚载阳、商美植、沈昌平、沈昌华、黄华诗、张日新、钱箴言、钱箴记、吴云峰、吴觉生、荣续芳等，其中鲁寿安占有的资本居首，为全厂股本的百分之五十。

解放后，长寿的工厂实行“条条与块块”双重管理，秦安纱厂亦不例外，上属川东行署工业厅领导，下由县人民政府直接管理。一九五一年 县人民政府奉中南财委转川东财委指示：“大资本家鲁寿安之股权占全厂百分之五十，鲁调走银元四万元供自己挥霍享乐，同时犯有诈骗罪，现于汉口被捕，冻结其在秦安纱厂的全部财产”。此后县人民政府指定资方代理人吴云峰等组成管委会执行厂务。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四川省工业管理局工联秘（55）字第0134号文批复：秦安纱厂与新友纱厂合并，名为“四川省合营长寿纱厂”，同时省工业厅以工秘（55）字第9098号文通知启用新印。尔后省工业厅（55）字第2339号命令：由任曲辉、吴云峰、汪测生为副厂长。

该厂经历公私合营，于一九五九年划归重庆市轻工局管理；一九六一年，改名“重庆市公私合营长寿纱厂”；一九七八年划归重庆市纺织局管理，更名为“重庆市第七棉纺织厂”。

(二)电炼厂

电炼厂创建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九月。伊始，由郭伯良、陈受昌、李久成等于上海辽阳路创办氧气厂。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陈受昌、李久成旋即来川，设办事处于重庆。陈自任董事长，李自任经理。民国三十年（1941）十月，陈、李等人在距长寿河街镇1公里的羊角堡创办“中国工业炼气公司长寿电炼厂”，由谢铭怡任厂长，时有资本500万元（法币），职工222人，护厂军警4人。该厂以石灰、焦炭、木炭、白煤、铁屑、砂石等为原料生产“葫芦牌电石”，产品畅销上海、武汉、西南各地，享有很高声誉。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后，陈受昌、李久成先后返回上海收复旧厂。陈任“中国工业炼气公司”董事长，李任总经理，将重庆办事处改为“四川分公司”，由钱祖恩任经理兼长寿电炼厂厂长，邢传箕任副厂长。民国三十五年，全厂工人增至202人，职员30人。民国三十六年，厂里900千伏安变压器不慎被焚，即将上海厂600千伏安变压器运来长寿安装生产电石。民国三十八年，国民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物价飞腾，经济全面崩溃，导致电石生产失调，停产数月，资金更加拮据，生产困难，钱祖恩乘机逃至香港，一去不复返，继由副厂长邢传箕主持生产业务。长寿解放前夕，电厂被国民政府破坏，该厂无电生产工厂，被迫停工倒闭。

解放后，长寿发电厂修复供电，电炼厂恢复生产。一九五一年，副厂长邢传箕、厂工会主席皮学良赴上海请求总公

司支援长寿电炼厂，扩充氧气设备。斯时，李久成出任台湾燃油公司经理，陈受昌因上海被敌机轰炸，氧气业务出现困难而辞去董事长职务。十二月，总公司改组，陈受昌复任董事长，郭明章任总经理，李恭先任经理，共同会商同意支持长寿电炼厂。

长寿电炼厂自恢复生产后，电力有了保障，加之总公司的支持，生产逐年提高，一九五三年为解放前夕的五倍。一九五四年，资方参加社会主义总路线学习，由余无外代表总公司申请长寿电炼厂公私合营。同年六月，公私双方成立“公私合营筹备会”，协商有关事宜，并组织“清产评议小组”清理该厂财产。旋即四川省财委曹处长来长寿渝光、恒昌、电炼三厂筹商合营事宜，并宣布自七月一起，三厂合并为“四川省合营川江电冶厂”，继奉长寿县财政经济委员会财工第116号文通知：关于中国炼气公司长寿电炼厂公股问题，四川省财委复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电告我委，按比例从“五反”欠款中拨出四亿元交四川追缴算出长寿电炼厂之公股。嗣后，“川江电冶厂”更名为“重庆铁合金厂”。

(三)火柴原料厂

中国火柴原料股份有限公司长寿分厂即现在全国享有盛誉的长寿化工总厂的前身，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五月十七日，在河街镇塘角湾成立。公司在上海、贵阳分设办事处，林天骥任公司经理，潘履洁任厂长。

民国三十一年(1942)一月，正式创办火柴原料厂。该厂属官商合办，投资3,000万元，(法币)其中国民政

府投资1,200万元，私人集资1,800万元。伊始，设备简陋，仅有自制磷炉一只，购置锅炉一个，电石炉一个，乳石机三台，职员15人，工人141人。工厂采用牛骨、硫酸、焦炭、石灰、砂石等作原料，生产磷酸、赤磷、硫化磷、氯化钾、牛胶、电石，并精制皮油、漆蜡、电极等。民国三十三年（1944），李国柱任厂长，周唐生任副厂长，技术员增加到64人，工人增加到452人。全年生产氯化钾65.49吨，磷酸13.92吨，硫化磷13.99吨，电极19.19吨，三号精制蜡25.95吨。尔后，孙宝华（江苏人）任厂长，陈番任副厂长，修建办公室一间，堆场三间，宿舍十二间，贷款4,000万元，生产显著下降。民国三十八年（1949）六月，工厂倒闭，仅有职工96人。

解放后，长寿县人民政府调查，该厂资本为贰拾亿元（人民币），官股占40%，且设备较完善，由重庆企业局代管。公私合营后划归西南工业部管理，改名三〇二厂，嗣后与三〇一厂合并，更名长寿化工厂。

（四）裕民面粉厂

长寿裕民面粉有限公司于民国三十年（1941）十月一日，在河街镇东街六十号（现五金厂对面）创办，属官僚资本家开办，有资本壹百万元（法币）。吴励生（江苏人）任经理，程寄浓任主任技师。

民国三十二年（1943），总资本增到二百万元，职工53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吴伯斧任总经理，周竞任经理，朱鸿良担任技师兼厂长，安置三个工头。厂里建立了股东大会、监察、稽核、董事会、经理、会计组、总

务组、营业组、工务组、重庆推销处等组织系统。动力设备有55匹马达一座；机器设备有四部磨粉机、三部粗磨、一部打麦机、两部毛麦机、两部四路平筛、一部圆筛、一部麸皮机。第一年生产头粉8,227袋，二粉18,646袋，三粉22,831袋，粗麸皮574,350市斤。细麸皮257,250市斤，各种面粉畅销上海、宜昌、汉口、长沙、衡阳、涪陵、重庆等地，深受用户青睐。

民国三十七年（1948）二月一日，总经理吴伯芳聘赵鑫任董事长。当年职工增到85人，月产面粉12,000袋，于时物价飞腾，流动资金周转迟缓，向长寿银行贷款8,000万元。长寿解放前夕，资方负责人弃厂逃离。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长寿县人民政府以工商字第110号文件称，裕民面粉厂因积欠上海粮食公司48,000余袋面粉，由上海军管会来长寿查封。川东财经委指定由长寿县人民政府代管，原厂经理朱修实筹备，王冠三、马达先等人投资4,000万元复工。一九五一年元月三日，长寿县人民政府以工商字第138号文件称，裕民面粉厂为代管公私合营企业，公股为95%，商股为5%。从一九五〇年起，各商股自愿退股。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县人民政府调列成章任协理员，冯天珍任人事员，划归涪陵专区工业科管理，改为四川省粮食厅第二面粉厂。

抗战时期 国立十二中暨热力同学会

汤维耕

日本侵略战争，由于蒋介石实施“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政策，日本侵略军得以节节进逼，湖北的巴东、湖南的芷江相继失守。国民政府上下腐败，兵燹连年，生灵涂炭，沦陷区的学生纷纷缀学，涌入蒋介石“偏安西南一隅”的四川。湖北省教厅为了解决入川学生的就学问题，乃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将湖北省立武昌第二中学迁往长寿县，距县城五公里的东新村（官庄）创建国立十二中学，该校直属中央教育部管辖。

国立十二中创办后，有诸多的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入学深造，或谋求个人前途，或立志为国献身。按照教育部之规定，百分之九十五的生源来自沦陷区的流亡青少年，其余百分之五的生源招收本地区学生，面对这些学生的成绩要求特别优异。如高五班甲乙丙班共100人，于本县只招收了郑德芳、李忠国（原名李硕民）、戴赋诗、陈治钧、雷德钧五人。国立十二中象当时我们贫穷落后的祖国一样，也是一所十分简陋不堪的学校，校舍极为紧缺，大多数校舍都靠租用民房。高中部、初中部、女生部和校本部分别设于官庄、北庄、樵子湾及冉家湾。各分部统一由校本部指挥。就以教学而论，开始几乎没有一件教具和实验仪器；学生睡的床叫双层铺，

上层系木板，下层也是连成一片的木板，无论系睡下层还是睡上层都是一个挨一个。这时的国立十二中的大部分教师系流亡到后方的老、中年知识分子，具有大专文化水平，业务水平较高，对学生有同情心，工作极为负责。陶尧阶、陈祖炳先后任校长、李寿季任教务主任；对学生的学、生活和纪律管理很严格。学生一进学校，不仅要完成各科作业，而且还要写日记、周记，也要为墙报、壁报写稿，参加作文及书法等竞赛活动。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及格者要补考，补考后仍有两门主科不及格的就留级。于生活方面的要求更为严格，不许迟到早退的。上早操要集合点名，早晚自习和就寝时要清查人数。教室和寝室的清洁卫生更不能马马虎虎，检查得很勤密。学校开办有衣场和供销商店，便于师生学习生活用品的供应。他们亲自动手用茅草搭棚盖起一幢能容纳千余人的简易礼堂，既可做食堂，也可作开会、演剧的礼堂。每周定期演出文娱节目，常演的有《屈原》、《雷雨》、《棠棣之花》等剧目，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学们对教养他们的学校一直怀着好感，非常珍惜这种学习机会，不但平时锲而不舍，刻苦钻研，争取优良成绩，而且还利用寒暑假进行自学，取得多方面的知识。所谓放假，只不过是改变一下生活方式而已！流亡到后方的学生无家可归，一到凄风苦雨的秋冬季节，夜静霜寒，衣单薄被，其苦况是难以言状的。他们虽然觉得学习、生活紧张，但没有一点反感，时间久了，就习惯了，逐渐体会到，当时严格的规章制度养成了不少好的生活习惯。因为他们深深懂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家破人亡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因此，学习、生活井然有序。民国三十五年（1946）夏天，大雨滂沱，县府督学杨应徵

十二中督察，目睹初中部和女生部的学生均专心致志读书，而高中部的学生冒着风雨，满怀激情地进行军训。杨应徵触景生情，遂将明代东林党（注）首领顾宪成为东林书院题写的一幅对联信笔写在校本部办公室墙上。联曰：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杨应徵到国立十二中督察归来，乃将情况回报县长肖洪九（开县人）。嗣后，肖县长亲自去该校调解校舍纠纷，解决校舍及设备上的困难。由于办学有条不紊，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笔者从县档案馆147卷记载的史料得知：民国三十年（1941）统计，国立十二中有二十五个班，学生1236人，教职员128人，于当时，其规模居我县之冠。

国立十二中创办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抗战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长寿虽地处边陲，也受到波及和影响，学潮时有发生，中学阶段是人生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主要阶段，也是人生从幼稚变为较成熟的关键时期，其经历往往给人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沦陷区的流亡学生没忘却血迹尚存的破衣，更没有忘却家乡、祖国的劫难，潜心学习，矢志为国，各年级学生按自愿原则，每人每月捐募两毛钱买些进步书籍聚集一起学习。书到手之后，或轮流阅读，或由一个人朗读，其余的人围坐着静听。说实在的，那时，禁令森严，进步书籍出版得少，再说读进步书也很危险，一经发现，不但没收书籍，而且还要坐牢。国立十二中的“读书会”就是这样秘密诞生的。“读书会”建立后，提出了“研究学术，已立立人，造福人群”的口号。“读书会”难得买到一册由鲁迅作序的林克多写的

《苏联见闻》这本哄动一时的书。同学们喜欢读，但暗暗着急，心里有一腔不可告人的神秘感情。高一班学生司马博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九月，司马博提议将“读书会”改为“热力同学会”，并呈报四川省政府，省府以社一字第6922号指令批复同意，热力同学会成立。成立大会上，以无记名方式选出司马博为主席，批准会员65人。大会还通过了《热力同学会章程》（简称“会章”）。“会章”分为：总则；宗旨；会名；会址；会员；会费；组织；分会成立；会章生效；会章修改，共十部分。其宗旨系：“联络感情，达成博爱之美德，交换知识，以达成人类之求知欲；由交换知识，联络感情而谋求全体会员之共同福利，进而为全人类谋取福利”；其组织系统最高权力机构系会员大会。大会设主席、副主席；主席、副主席下设监察委员会，基金委员会及干事会。三个委员会相互并列。监察委员会和基金委员会各设主任委员1人，委员若干人；干事会设编辑股、文书股、总务股、学术股、福利股和宣传股。各股分别选出股长1人，各股分别任命干事1人。主席的产生由会员大会以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选举，同时，民主选举的主席倘若不合格或违犯《会章》者，一经查明，最高权力机构——会员大会可罢免其职务，三个委员会之主任委员若有不合格或违犯《会章》者，主席有权罢免其职务。为了加强舆论宣传，扩大其组织力情，干事会创办了《热力通迅》作为会刊。两年中共出期刊（油印）11期。“热力同学会”是抗日战争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它的诞生和成长，不但丰富了学习生活，而且激发了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它成为当时我县学潮的先声，于社会风气的开化都有